

论朱英诞新诗中的“流浪”书写

许祖华,王易新¹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 流浪是文学书写中的传统母题,朱英诞新诗中的流浪主要体现为远方的追寻者、徘徊的怀疑者及无力的漂泊者三个方面。正是在“茫然的时代”“异质的文化”和“艰难的寻根”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朱英诞新诗中的流浪书写呈现出了一定的丰富性与深刻性。此外,朱英诞还以诗意而富有哲理的语言回答了如何面对和解决流浪这个命题,即诗意地栖居与冷静地旁观。

[关键词] 朱英诞; 新诗; 流浪; 远方; 诗意栖居

[中图分类号] I20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0)06-0110-05

DOI:10.13967/j.cnki.nhxb.2020.0102

从西方的奥德修斯、堂吉珂德等人物形象塑造,到中国《老残游记》、鲁迅等作家的乡土小说、东北作家创作的流亡文学,再到新时期以来张承志、三毛等作家的创作,流浪一直是文学的传统母题。朱英诞借助诗歌,丰富了“流浪”的内涵,更回答了如何面对和解决流浪这个命题。

一 何为流浪:追寻者、怀疑者与漂泊者

朱英诞新诗中的“流浪”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即远方的追寻者、徘徊的怀疑者、无力的漂泊者。正是对远方的憧憬,激励着流浪者欣然踏上旅程,然而旅途的艰难、理想的难寻又使其陷入怀疑之中,并有了归去的渴望。但“能否归去、归去后会怎样”的困惑,使得流浪者再次流浪,只能饱尝无力之感。

(一) 远方的追寻者

远方,未知而神秘,令流浪者心驰神往。朱英诞在《窗》中写到:“流浪者的天的一方,做你的梦梦的小池塘。”^{[1]475} 在这篇赠与林庚女儿的诗作中,这一方流浪者的天空,成为了孩子梦境的背景,包纳了诸如月光、垂柳、青草等诸多美好事物。流浪者所拥有的,是广阔无垠的天地和五彩斑斓的诸多可能。

但投身远方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流浪,意味着与过去厌恶的甚至是深爱的东西一一告别。在《秋深》中,游子何曾不想尽享天伦之乐,但远方,就像万籁俱寂的星空中那颗最亮的心,使他痛下狠心,舍

弃母爱的牵绊。纵然在流浪的旅途中也会有徘徊和若有所失之感,六弦琴的琴声中有着抑制不住的悲伤,但终难动摇游子心中的信念,他最终消失在了茫远的天边,去了想要去的远方。

在《城中谣》中,远方是支持流浪者穿过黑暗抵达光明的力量源泉。朱英诞以地狱与天堂作比,从地狱而来,经过了人间的洗礼,流浪者已从青春少年变得风尘满面,但他心中始终念着天堂。“累累的大树枝,负载着果实。碧绿的城,阳光充足的城”^{[2]569} 描绘的便是其心中的愿景与远方。这场孤独而艰难的旅行,也曾让流浪者倍感疲倦、产生迷惘,但他仍如飞蛾扑火般对远方满怀深情。如《倦知》中写到:“爱心/在一个流浪的汉子/是一文不值的/智慧/这可怜的水银珠/在痴情面前//光辉的星当空而巨大/风中的小船又吹走了/我从来不曾疲倦吗/对这画与夜的磨难?”^{[3]57} 以“鸟倦飞而知还”来反衬“我”的“不知还”,因痴情而深陷其中,哪怕眼前只有磨难也阻挡不了前行的脚步。

远方何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这正如王卫平所指出的,“流浪必然包含着生活流浪,但又不以生活流浪为指归,不以追求正常人的物质享受为目的,而主要是出于一种精神的追寻,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一次经历的探险和自我意志的磨炼”^[4]。这种前行的韧性与文化基因中的进取精神息息相关,朱英诞曾言,“有两点使我钦佩曾在罗马苍茫吊古的歌德。

[收稿日期] 2020-03-27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身体意识与民族国家想象的冲突融合研究”资助(编号:19YBA146)

[作者简介] 许祖华(1955-),湖北仙桃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¹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即是《浮士德》,因为它和我们的‘天行健的哲理相似’……。”^{[2]399}正是那永不满足的如同浮士德般的抱负,激励着流浪者奋然前行,无畏亦无惧。

(二)徘徊的怀疑者

流浪人所向往的远方可能美丽、神秘而魅惑,甚至有一种摄人心魂的力量,但其追逐远方的过程,是充满失意、寂寞与愤怒的旅程,是美好梦境的不断破灭。这种怀疑,除了体现在作为目标的远方,也存在于流浪的过程之中。“流浪者负荷着星天”^{[1]324},一如月宫的流浪者——吴刚,他披星戴月的奔忙不过是白忙活一场,没法带来任何的改变:“烧荒的牧童依旧在林间/月宫的大门依旧紧闭”,就如同西西弗斯,虽然一直在忙碌,实际上却是无意义的重复和虚无,不过是做着无知的游戏,让自己陷于流浪的牢笼。

家是流浪者心中最温暖的地方,归家是否就意味着流浪的终结?于梦中归家,寒鸦群如波浪涌起。鸟倦飞而知还,以群鸦的归家反衬“我”离家漂泊之心。这颗流浪的心渴望得以安憩,家门与落日、斜阳与流水有着脉脉温情,高楼上亮起了灯,诗人的心在那一刻获得了温暖,但这份光明却是短暂的,没有月的夜下是一片黑暗与死寂,一丝不安便在这犬吠与更声中酝酿和涌动。“我落在你的梦里,而梦是否光明”^{[3]310},《怀疑》的题名表明作者对此是怀疑的,而在梦以外的现实是否有光明呢?能否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回答同样值得怀疑。

同样的场景在小诗《归》中也有展现:“温柔的足音/沉醉/长林的甬道那边/有穹门的光亮//孩子们坠着秋千/我走过去/葡萄熟透在无花的路面上/石像永远是孤单的//汽车的红箭指过去/袅袅的遍绿的街间/多高的红树上才有梦寐/晚来的露台上没有远眺//当流浪归来/蒙蒙中/吹起一道码头的长笛!”^{[1]269-270}午夜梦归,和熟悉的故土一一拥抱,热闹的秋千、熟透的葡萄及袅袅绿街,这些美好而富有生气之景又与凄凉孤寂之物,如孤单的石像、空寂的露台和突兀的红色等(汽车的红灯与红树)以蒙太奇式的手法加以拼接,因而这梦回,绝不是简单的怀念与追忆,更有一丝犹疑与担忧。在短暂的回归后,汽笛催发,“我”不得不陷入新的流浪。

这与鲁迅先生小说中的“离去-归来-离去”的叙事模式达成了某种暗合,如果说最初的离去饱含斗志与憧憬,是一种“主动的流浪”;归来后的离去,则陷入了一种“被迫的流浪”,有一种不得不流浪的无力与苍凉。

(三)无力的漂泊者

朱英诞曾发出“人生无根蒂,飘然陌上尘”的感

慨,“陌上尘”便是对这种漂泊感的生动表达。《途中(一)》中的“我”处于一种漂泊的焦虑之中,身在中途,面对未知的前路追不上前人,却被后者很快赶超,且找不到自己的来处和归途。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孤高悲怆不同,《途中(一)》弥漫着找不到自己位置的焦虑和无奈。朱英诞在《途中集》中的小序便是这首诗的最好注解:“但丁《地狱》第一行的诗句:‘方吾生之中途兮’。使我不禁有感于语默维谷……元结《自述·述居》有云:‘人生于世,如行长道,所行有极,而道无穷。奔走不停,夫然何适。’”^{[5]76}在这里,漂泊是一种状态,人们只能面对着无穷的道路始终流浪。这种流浪常使人陷于困境,有一种无力把握命运的悲凉。

朱英诞在《解缆集》补序中曾言:“恰好我最早读的陶集,就有如此明白的诗句:‘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止泊吗?像一只破船靠在岸边?那是不堪设想的!不过那时视野湫隘,也不善于异想天开,既不懂得征服月亮,也没有下地狱的奢望,不理解蚁行磨上欲西返东,也不理解枕石漱流的归隐,更不理解向‘三神山’首途的船儿‘风辄吹开’之苦……。”^{[5]220}“蚁行磨上”出自《晋书·天文志》:“蚁行磨上,磨左旋而蚁右去,磨疾而蚁迟,故不得不随磨以左转焉。蚂蚁本来想往右去,却因为身在磨上不得不随着往左旋转。三神山上传说有仙人居住且有长生不老之药,宫殿华丽且多奇珍,但“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仙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很多美好的愿望只能成为空想,然后徒增无奈的喟叹。

二 因何流浪:时代、文化与无根

朱英诞的流浪书写呈现出了一定的丰富性与深刻性,较全面地展现了流浪者的心路历程。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与诗人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更源于中西异质的文化与诗人艰难的寻根之旅。

(一)茫然的时代

朱英诞对灿烂的“五四”满怀憧憬,但只能落寞地在北京凭吊古战场,追想当年的盛景。他常常自问,“‘五四’岂非就只是一个春天吗?但以语‘贤知’与‘众庶’,则笑而不答,而其意乃仿佛若曰:送春者皆自崖而返,春自此远矣。这多么令人沮丧!”^{[2]43}他也为我们的民族过去是“诗的民族”而骄傲不已,却又不得不承认所处时代的尴尬:“至于当代,我们和古昔和海外很难相比,虽然说‘人情公有’,”^{[2]58},只能在古代文化的辉煌与海外文明的璀

璨中黯然神伤。

朱英诞所处的时代动荡不安,战争此起彼伏,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因而他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叹:“乱世苟全,生死皆细事,哪里还会有桃花飞红,清明时节听野哭的闲心!”他自称为“大时代的小人物”,既有避世隐遁之意,又体现了为时代、社会挫败的无力之感。诗人的流浪感与时代的裹挟息息相关,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既无法像武人为国家尽一份力,亦无法著书立说,在诗界、文学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朱英诞看来,对政治与物质的过度关注,造成了对精神追求的偏废,“我们过去号称‘诗的民族’,但是,假如现在有谁来倡议举行一次选举,我将投爱尔兰或西班牙一票。我却不选我们中国。中国实在太不成话了,罗曼·罗兰说得很公正,他认为精力都让政治经济占去了。现在这里最好的诗人也是只有诗才,而无诗学。他们在打游击。我只是在家园里掘一口井。”^{[2]558}“在家园里掘一口井”,便是对挤占精神自由的物质文明的质疑与反抗。面对政治,他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精神上的自由。“畏名利如猛虎”的他,以诸葛亮的半句“苟全性命于乱世”总结自己的一生。相较于在政治舞台翻云覆雨的狂热者,他是格格不入的、孤独的流浪者。

(二)异质的文化。朱英诞的文化背景是复杂的,既有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有欧风美雨的借鉴。他曾回忆,“‘卢沟桥事变’后,开始了精神上的远行,这段形役大概有十年光景。一九四七年冬,自寒荒归来,在一个大冬雪日重新阅读韦江州集,才结束了我的驴背之旅。惟《浮士德》常置案头而已”^{[5]212}。

这场长达十年的精神远行,便是在中西两种异质文化间的流浪之旅。他曾“对东方(包括日本)的一切都不免怀疑起来”,但也是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他重新找到了文化自信,但又对西方文化有着博大包容的胸怀。“我以为我们中国文史哲较发达,而缺失在科学不昌明;欧洲科学进步,而政治实在是瞠乎其后:从凯撒起,成功为凯撒主义,经拿破仑,直至希特勒,尚远远未能到达一个类似秦始皇的局面,这该是多久的时间呢!又有什么可以妄自尊大的?他们的美术、诗文学、哲学、自然也是很崇高的……纵目眺望,以及透一透空气,不致蒙密一室,知道远方的星星点点人烟稠密的地方所在多有,如此而已。倘以此为旁观,则旁观者清,也未为不可者也。”^{[5]198}因而,流浪的意义是不至于逼仄,能在与其它民族文化的相互参照中获得本民族文化的定位。

(三)艰难的寻根。传统中国有着很强的宗族意识,故乡是中国人文化记忆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在外漂泊的游子日思夜想的“根”。但对于自己的故乡,朱英诞饱受寻根的迷惘。他的祖上柘园公逃难至如皋,曾祖父曾在武昌城置有藏书楼,又在江西游宦甚久,后又因被祖父的仇人告密,逃难至北京天津一带。他还曾言:“我的母亲是历城人,但她生长在黄鹤与鹦鹉的山山水水之间;我的祖母是洛阳人,她在江南住过好几个地方;后来她们也都来过北京寄籍。”^{[2]55}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一脉,都有着复杂的迁居史。

因而他“常自嬉,谓家在江南也在江北:我个人却生长于津沽与北京——我家寄藉是宛平”。“北京东郊大亮马桥有我家坟莹,远望那里有一株瘦硬的马尾松,大约已经三代以上了;我们都不是这里的土著者。那么,我与北京的感情当然是建立起来的……”^{[2]55}。朱英诞一生从未到过江南,更不用说江北的如皋,他只能借助梦境,回到心中的江北与江南。而他自己,也是多次辗转迁居多地。正是生活的不安定和寻根的艰难,使得“流浪”一词屡次付诸其笔端。

三 归向何处:诗意地栖居与冷静地旁观

流浪,既使流浪者实现了因保持一定距离而带来的独立性,也意味着在地理与心理空间上处于漂泊无依的状态。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流浪?朱英诞通过新诗,给出了他的答案——诗意地栖居与冷静地旁观。

(一)诗意地栖居

诗歌于朱英诞而言,是在自我的园地里自由耕耘的硕果,同时也是实现启蒙理想的途径。朱英诞曾说,“文近庙廊,诗近田野——我想我们在蔬园中偷瓜,越篱逃逸的野趣,非诗而何?”^{[2]548}一本正经的庙堂文学无法拥有诗歌的野趣,而在新诗的田野中,他可以摆脱各种各样的束缚,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本真纯粹的存在状态。诗歌不需要板着一副脸孔,而是真实自在、独抒性灵的,因而能实现诗意地栖居,让灵魂不再流浪。

我们或许会以为诗人朱英诞与时代政治存在着某种疏离,有着更多老庄之道的洒脱;但若细细体察,会发现他还有与儒家思想相接近的另一面。学者王泽龙在论文中写到:“朱英诞自身多病且处于动乱的年代,终其一生都未曾真正实现过自己的理想——希冀借由诗歌起到药草之华。”^[6]

细究“药草之华”,朱英诞竟在散文中多次对此有详细论述。首先,“诗是文艺的花朵,而且,我们

的民族之魂不就是以‘华’为图腾的吗?华即花也。生而为中国人,虽处于末世,不赞成‘诗的民族’的尊号,花却是可看的”^{[2]397}。在朱英诞那里,诗歌与民族息息相关,是中国文艺的和中华民族的代表。

但将诗歌与“药草”联系起来,朱英诞颇费了一番功夫,对于诗歌的功用也常常表示怀疑,却始终暗暗希冀其“有益”：“我尝想,明知其无用,而总还是想着要有一点点什么益处才好,我的诗,若然,殆类似药草有花欤……。”之后则坚定地相信,诗歌的功用,不能仅从此时此刻体现出来,而应该放置于更广阔的时空之中：“我向来爱‘神农窟前,百药丛茂’的古传说境界,后来看到日本现代评论家称之为‘牧歌’,觉得未免比拟不伦,却更增加了我自己的主观色彩的真理:药草与花是有用的,而当其无,方兴未艾,有来者之难诬。我们正不妨说,犹七年之病,蓄三年之艾,艾以干久者善也。”^{[2]396}因此,朱英诞才说：“我的诗之不能比拟韩信之将兵,是不待言的,但我的药倒也不妨‘多多益善’,即使这些药物全不是好的,只以病理学的资料来看,仍是可供参考的了。”^{[2]400}

诗歌作为“药草”的功用,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自身的疗救,即通过诗歌这一窗口,诗人的苦痛和哀伤能得以自由地抒发和排遣：“神农尝一日中十二毒,可谓大圣不愧为真正的救世主了。我则不可,知道未可医国,还是取其副作用,药自己来吃,对别人,则作为观赏植物吧……古希腊司药与诗者为一神;俄罗斯古谚云‘病有病福’;宋范石湖,多病者也,而藐视疾苦,死前不休,籍重诗文,成其技进,也是应该钦羨的”^{[2]395}。二是对他人的安慰和启蒙。朱英诞曾言：“后来读黑格尔哲学,懂得‘心灵,就其本质来说,是悲剧的’这道理。我也想,人文的目的,岂非就在使这悲剧得到净化?”^{[2]404}诗歌能为人们的心灵提供一个短暂的休憩之所,使他们从现实的悲剧中重获力量。

此外,诗歌还能在精神被偏废的时代中,以美感启发人们的心灵。说到启蒙,人们常常会自然地联想到“五四”时期的战士——鲁迅。然而,不同于鲁迅的现实功利性,朱英诞的启蒙更带有某种抽象与超脱之感,使一般人从凡尘俗世中解脱出来。被启蒙的对象不是愚昧的国民,而是麻木的诗心：“虽然时至皮肉都须仰仗钢铁之今日——更‘非诗化时代’,但‘安适便利’岂有生于官能靡乱的各色角落里之理?诗人虽然在写诗的时候好像‘浪费光阴’或像‘忧郁的出世者’,其实真诗人莫不是用欣赏态度写出美感的——拿这传达给一般人正是想使一般

人也能抱着欣赏的态度,转而去领略或感受生机的妙趣(因而安适),使人觉出一生并不只如一部呆板的机器之无味乃能立定脚跟好好的活下去(因而便利)——这就是人类中较高的企求,却正是在诗中找出的。”^{[5]2}

正如卡西尔所言,“人的生活世界之根本特征就在于,他总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总是向着‘可能性’行进,而不像动物那样只能被动地接受直接给予的事实”^[7]。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是因为人善于构筑自己的“理想世界”。沈从文用小说和散文构筑自己的“希腊小庙”,朱英诞则用诗歌构建他的理想世界,“予向有三自三生杂说,三自者,自然,自我,自由;三生者,生存,生活,生命”。在这样的世界中,人们能从生存的层面向生活与生命的层面发展,并最大程度地接近身心的自由,摆脱精神上的漂泊和流浪。

(二)冷静地旁观

如果在残酷的现实前无法结束漂泊,便选择改变自己的心态,只有拥有旁观的心态和审视的距离,才不至于在流浪中迷失。如朱英诞所言,“我倒宁愿做一个清醒的道旁子”^{[5]533}。

诗歌《幻尘》^[8],便写出了一种淡看世事变迁、浮云流转的旁观感。“虽然我流浪,没有家”,诗歌的抒情主人公无家可归,但恰恰是因为它是“流浪者”,正是由于与它们没有发生牵连,所有的人或事于“我”而言皆是过客,因而能以旁观者的心态默默注视着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

穿越了历史的风尘,当“阿房、未央和铜雀”皆化作灰烬,昔日金谷园的繁盛也不复存在,只剩下星星点点的瓦砾四散在无边的野花之中,“我”也便在这种断壁残垣的凄凉之景中思索人生与生命的意义,探究什么才是永恒的存在。历史虽然曾经真实地发生过,但当一切随着时间流逝而湮灭无痕,它便如一场梦给人以不真实之感。“梦想是淡淡的天空”,于凄艳夕阳中闪烁着的,是辽远却阔大的虚空。标题“幻尘”也写出了这种虚无之感,佛教中以色、声、香、味、触、法为尘,以尘为代表的物质世界是虚妄的,但与此同时又暗含了一种超脱感。

《幻尘》与“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无论历史上有过怎样的繁华,在天地、宇宙与自然面前终归是渺小而短暂的。以自然为参照,是获得旁观姿态的方式之一。在诗歌《流浪人之歌》诗人写到:“流浪人看风景/像读书/揭开第四页/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是/死?/让自然是一篇诗/诗的白文/啊 我们这些可怜人/可

怜的注释者!”^{[9]513}自然是一本大书,流浪人和我们都有着既定的命运,我们无法主宰结局,只能成为注释。“当我一息尚存而能伏案时,我以为凡我们想到的死者甚至未生者都是窗前灯下晚间的来客,他们都是活人,和我一样……和光阴一道,其实我也是一个过客,简言之,我不是自然的主人”^{[2]43}。

《西山》如同得道高僧对凡人加以点化,站在当下对一个人的一生加以回溯。从被小山环抱的婴儿的安恬,到童年时期漫天遍地的翱翔,至恋爱遭遇困境的悲伤,再到处处掣肘、事与愿违的逃亡,最终以“参天的青色蓬和有趣的佛前的小灯”为归宿。朱英诞以富有哲理和诗意的语言,描绘了流浪的困境:“我怎样走去呢 当前的绝径? 而那末路/在哪里? 我怎样走来 用足跟 拇指还是手呢? /我是要直去走的 它却给我一条/横的危石而我必要横行走去//那没有一点尘埃的大山忽高忽低/隔着削壁的树声像轻雷/你将要向左边走去吗? /好的 你向右边走来吧”^[9]当所有的期待全部破灭,所有的结局皆与预期相反,流浪者似乎已是身心交瘁。“秋天的萧萧的风雨/那是被压到底下去的河水的流浪”,这句看似写景,实则暗含深意,河水蒸发而升腾,但却被迫压下去降落为雨,像极了人世的沉浮。殊不知,借着升温的东风,它又将迎来新的契机重新飞翔。因此,那些流浪、彷徨与踟躇,皆是人生必经的旅程。只有我们有着更广阔的时空观与更豁达的心胸,才能不在一时的苦痛中沉沦,才能拥有一份超然物外的洒脱。

有了超拔的视野和旁观的态度之后,也就能获得某种解脱,这可从朱英诞对“途中”一词的不同理解作为例证。在《途中草序》中,朱英诞回忆自己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很有些‘方吾身之中途兮之感’‘有一个暗影像梦魇一样压在头上’”,身处“五四”

这一短暂春天离去的沮丧之中。

但是,通过拉开时空和审视的距离,四十年后加以反观,始觉实乃“幸草”:“火燔野草,车辗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2]97}。与“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有异曲同工之妙,野草在车碾压过后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却在一场意外的野火前得以幸存。于是他发出感慨,“让我也来学鱼儿暂出水面透一口气吧。生命就是生命,‘趋而急行’是无谓的。我以为我们还要经过一点相当长的,而且是筚路蓝缕的行程:若然,此非中途而何?”^{[2]97-98}正是“学鱼儿暂出水面透一口气”,即从现状中抽离而不是沉溺其中,从自然的恒常中加以冷静地旁观,才会明白,中途除了是漂泊中的徘徊,更是下一次出发的开始。因此,我们也就能从流浪无依中重获前行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 朱英诞. 朱英诞集:第1卷 现代诗卷1[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
- [2] 朱英诞. 朱英诞集:第9卷 散文卷2[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
- [3] 朱英诞. 朱英诞集:第3卷 现代诗卷3[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
- [4] 王卫平,徐立平. 困顿行者与不安定的灵魂:新文学中知识分子的漂泊流浪[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1):102-107.
- [5] 朱英诞. 朱英诞集:第8卷 散文卷1[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
- [6] 王泽龙,伍娇丽. 朱英诞旧体诗的形式特征[J].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016(1):61-69.
- [7] 卡西尔. 人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3-4.
- [8] 朱英诞. 朱英诞集:第4卷 现代诗卷4[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250-251.
- [9] 朱英诞. 朱英诞集:第2卷 现代诗卷2[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466.

On Writing of Vagrancy in Zhu Yingdan's Modern Poetry

XU Zu-hua, WANG Yi-xi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Vagrancy is a traditional motif in literary writing. The wandering in Zhu Yingdan's modern poetr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far-off pursuer, the wandering doubter and the resigned drifter. It is under the joint ac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the loss era, the heterogeneous culture and the difficult root-seeking, that the Vagrancy writing in Zhu Yingdan's Poetry presents certain richness and profundity. In addition, with poetic and philosophical language, Zhu Yingdan also answers how to face and resolve vagrancy, that is, poetic habitation and calm spectator.

Key words: Zhu Yingdan; modern poetry; vagrancy; the distance; poetic habitation

(本文编辑:魏月华)